

重商传统与耿车模式及其环境转型

陈阿江

(河海大学 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 农商关系是一个古老话题。重农或重商传统与区域发展关系密切。在中国总体重农大传统的背景下, 地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形成了地域性重商小传统。在梳理大传统、小传统的基础上, 理解耿车重商小传统与耿车模式及其绿色转型。耿车货郎担经营的重视市场的特点促成了耿车模式的形成, 但耿车重商小传统内重视商贸而忽视技艺的特点, 使其废旧塑料加工技术推进有限, 注重短期利益的特点造成环境污染。在“铁腕治污”环境规制背景下, 废旧塑料行业被迫取消。重商小传统中的开放性特点, 使得生产者善于向外界学习。部分企业探索电子商务, 进而发展了以家具制造电子商务为特色产业的新耿车模式, 从而完成了废旧塑料回收加工行业的环境转型。随着现代化的推进, 工商传统正在替代农本传统成为主流, 并在工商文明中嵌入绿色生态文化。

[关键词] 小传统; 耿车模式; 绿色转型; 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 C 912. 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22)05-0137-08

[DOI] 10.16783/j.cnki.nwnus.2022.05.015

一、 导论

农与商的关系, 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古希腊时期, 斯巴达与雅典, 就是重视农业与重视商业手工业的两个典型的城邦国家^[1] (PP. 132 — 151, PP. 167—192)。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也曾进行过有名的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讨论。

中国历史上也存在关于农商关系的讨论。一般认为, 自秦国商鞅变法重农, 秦汉逐渐奠定“重农抑商”政策的基调, 逐渐形成了重农抑商或者以农为本的国家治理理念。在秦汉一统至晚清开放这两千多年时间段中, 说中国是一个重农抑商或者以农为本^①的国度, 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 但也存在不同时间、空间上的例外。

首先, 从时间维度看, 中国历史上, 有的时期是比较重农抑商的, 而另外有的时期则更为重视商业手工业。以南宋为例, 从国策来看, 并没有明显的抑制商业手工业发展的倾向; 从产品种类、工艺、贸易范围来看, 不管是手工业还是商业都是高度发达的。这当然也与南宋王朝每年需要向北方王

朝提供大量的赔款和丝绸锦缎等实物有关, 但其工商业的发达也是不争的事实^[2]。

其次, 从空间维度看, 中国整体而言是“重农抑商”的, 但在不同的空间具有不同的表现, 在局部地区呈现“农商并重”甚至是“重商主义”的特点。很多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性商业模式。中国著名的十大商帮就是很好的例子, 尤其是徽商、晋商, 所在地方社会对于商业贸易的重视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即使是像十大商帮之末的洞庭商帮, 仅涉及区区太湖里的洞庭东山、西山两岛两百多平方公里的小地域, 但此两岛与附近苏州其他地区的农村有显著的差异。出现整体的“重农抑商”和局部的“农商并重”或“重商主义”其实不奇怪也不矛盾。因为中国地域无比广阔, 各地的地理区位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状态的差异性非常大, 加之商业无论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国家的政治、军事、财政税收等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重要性, 所以出现了总体以农为本的大传统与局部地区重商的小传统并存的格局。

基于上述整体性分析, 我们就不难理解作为局

[收稿日期] 2022-06-15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耿车模式’的绿色转型研究”(19SHA002)

[作者简介] 陈阿江 (1963—), 男, 江苏吴江人, 河海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环境社会学、城乡社会学研究

部地区发展类型的耿车模式。耿车地处相对不发达的苏北地区，曾处于因黄河夺淮而形成的黄泛区，是工商业相对落后的农业生产区，农本是其基本特征。但若就地方小传统看，发轫于民间的货郎担生意作为农民生计的重要补充方式，其蕴含的商业思维、贸易策略等，不管对于以废旧塑料回收加工为主的耿车模式的形成还是对于后来从废旧塑料回收加工业向家具电商的转型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耿车的重商小传统为切入点，讨论地方性重商小传统是如何形塑耿车模式的，以及重商传统又是如何引导走向以电商为主的新耿车模式而实现耿车模式的环境转型的。

耿车虽为苏北的一个普通乡镇，但在社会学界已是“学术名镇”。费孝通于1986年在淮阴调查时提出了耿车模式。耿车模式采取了乡办、村办、联户办、户办“四个轮子”一起转，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协调发展之路^[3]。之后，费孝通没有对耿车模式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其他学者关于耿车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耿车模式这一概念及其发展，如胡同恭对耿车模式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认为耿车模式的特点是合作经济与个体经济相结合，但以个体经济为主；机械加工技术与手工技术相结合，但以手工技术为主等^[4]。

然而，当年没有引起费孝通足够重视的环境议题，成为后续耿车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周拥平等较早地关注到耿车镇的环境污染问题^[5]。王刘飞、王毅杰以耿车一带的废旧塑料产业环境治理为例讨论运动式的环境治理策略及其价值，并探讨政府治理的方向与社会产业转型、民众认知方向与治理成效的关系^[6]。陈涛、李鸿香分析了耿车镇产业环境转型与环境治理实践，强调系统性治理的重要性^[7]。另一类研究则聚焦于耿车镇的家具电商发展，如电商积聚效应^[8]、农村电子商务对村落社会空间的影响^[9]和乡土重构^[10]等，但没有与环境转型关联起来。

与本文主题重商议题关联的另一个研究是关于浙商与浙江经济的发展研究。2003年，《浙江学刊》组织一批学者就义乌发展进行专题研究，研究者围绕“拨浪鼓文化”这一主题探讨地域传统与义乌经济发展的关系。由于义乌一带人地关系紧张，所以很早就形成了通过“鸡毛换糖”的方式补充家庭生计的小传统。有研究者认为，“拨浪鼓文化”

是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区域文化，是游离于官方的、自发自动的民间文化，是与农业文化迥然相异的商业文化^[11]。这虽然可能过分强调当地与传统农村地区的差别——“拨浪鼓文化”可能只是与农业互补的一种文化，但重新认识“拨浪鼓文化”是有价值的。舒国增总结了“拨浪鼓文化”的基本特点：首先是隐含在“拨浪鼓文化”中的自立自强的主体意识，货郎担式小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们对大自然的过分依赖，培养了人们自立自强的主体意识。其次，货郎担经营培育了重商尚利的市场观念，培育了义乌人为追求商业利益而闯荡经营的市场观念。再次，“拨浪鼓文化”隐含着兼容并蓄的开放意识，货郎担式经营活动使得义乌人具有强烈的向外拓展的开放性和兼容并蓄的开放意识。此外，货郎担生产经营活动还培养了义乌人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刻苦务实的实干精神^[12]。厉佛灯则认为“拨浪鼓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开放性，而“走出去”是开放性最主要的表现形式^[13]。显然，义乌人的商业意识既有其共性，也有地域文化的特殊之处。

本文的研究资料，除了2019年对耿车镇的实地调查，也源自笔者多年来对苏南模式，以及对晋商、徽商的实地调查与思考。本文拟从经验研究出发，但超越具体的细节的经验资料，借助环境这一特殊变量，比较抽象地讨论中国地域文化传统对发展模式的影响。

二、重商传统与耿车模式

在上世纪40年代，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中国社会是以农业生计为基础的乡土社会^[14]（P1），整体上呈现乡土性特征，而乡土社会与城市社会（或工商社会）相比是有显著差异。事实上，费孝通当时所说的乡土社会主要是指农耕地区，但就当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看，其实还有相当广袤的地域并不是农耕地区，有的是牧区，有的是林区，或者农牧、农林的混合地区。若就农业（广义农业）与工商业比较而言，就费孝通《乡土中国》成书（文）的年代而言无疑是农业社会，甚至迟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还是农业社会。宏观的统计数据，可以很好地佐证这一判断。如195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中，第一产业占比过半。到1980年，中国的第一产业降

至三成，二三产业占七成。但若以县域为单位考虑，即使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农村地区。以耿车镇所在的宿迁为例，1980 年宿迁市（县级市）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中，第一产业占比过半。因此，至改革开放初期，除了一些乡镇工业先发展地区，大部分县域范围内，依然是农村社会。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宿迁市^②也不例外，就市（县级）域范围来看，依然是一个农村社会。

如果把乡土社会中的农本理念视为“大传统”的话，不同的地域还发展出很多的非农小传统。在形成徽商、晋商等著名商帮的地区，乡土社会的大传统也是基本存在的，只是在乡土社会这一大传统之外，还很好地发育了商业小传统。耿车镇一带也有这个特点。

大传统、小传统的概念最初是美国学者芮德菲尔德提出的。芮德菲尔德认为，大传统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是指在农村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文化^[15]（P95）。由于文化的复杂性、多样性，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来划分大传统与小传统，如郑萍就从村落视野中去发掘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意蕴^[16]。吾淳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提出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划分标准。他认为，“大传统”与“小传统”不应当依据精英与大众、高级与低级来加以界分；而且也并非国家层面的就一定是大传统，民间层面的就一定是小传统。确定“大传统”与“小传统”应从主流与非主流的角度来理解，或从主流与支脉的角度来理解。这里所说的主流就是指一种传统的实质或基质，它涉及如下两个基本要素：空间上的规模或覆盖面；时间上的影响或持久力。^[17]

因此，对农村中的农—商关系的大传统、小传统划分，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或者是基于前人关于大传统、小传统研究的划分中方法论理解加以区分；或者根据吾淳提供的划分标准。笔者以为，中国传统农村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是农本传统，可以认为是大传统；但在不同的地区同时存在重商或农商并重的小传统。就商而言，其实还存在内在的差别。纯粹的商贸传统与工商兼顾的传统，对后续的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如浙商传统和浙江地区的发展，与徽商、晋商和皖南、晋中地区发展的差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陈立旭通过对区域工商文化传统的差异分析，认为徽商和晋商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文化传统，而浙商则是工与商结合的、集手工艺人和商人角色于一身的“艺商”。如果说盐、典、木材、茶叶以及票号等经营活动是徽州人和山西人的文化记忆或“惯例”，而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等以及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等经营活动是浙江人的文化记忆或“惯例”，那么，因改革开放对具有徽商、晋商传统的地区从事经营活动没有“偏爱”，却有利于“艺商”的发展，导致在改革开放后徽商、晋商与浙商的差异在相应区域里产生了不同的发展效应^[18]。

借用上述的分析路径， we 有机会从更为宏观和抽象的角度去理解耿车的传统与其发展的关系。黄淮海平原总体上是以农业为主、缺乏工商业传统的地方。地处黄河故道的耿车镇，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差。因此，很久以前村民就开始寻求其他的补农方式以维持生计。与此同时，耿车镇的交通条件较好，位于水陆要冲，有“宿迁西大门”之称，因商贸集聚而成。故而，耿车镇一带的农村有一定的商贸传统。货郎担生意就是当地的一个传统。货郎走街串巷，以针线、糖果等物换取废旧物品。在耿车货郎担贸易实践中，废旧塑料逐渐成为一个重要而专门的门类。在一位下放至耿车的南京干部建议下，1973 年，五星大队第三生产队购买塑料加工设备生产简易的塑料制品^[19]（P113），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到上世纪 80 年代，五星大队的塑料加工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这家塑料加工厂成为星星之火，推动了耿车镇塑料回收和加工行业的大发展。

费孝通提出的耿车模式，是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有所不同的另外一个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是以乡镇、村集体企业为主，共同富裕为目标，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实现就地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20]温州模式是一种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发展格局的发展模式。费孝通指出，耿车模式“既不具备苏南模式集体经济的基础，也不具备温州模式的大市场。耿车模式更适合那些缺乏工业基础的农村。”^[3]费孝通

比较关注的所有制特点，经过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转制改革，已经弱化甚至消失。但模式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文化特点，依然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另外，当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环境议题，在后续的发展中却成为耿车模式生死攸关的大事，而这一点也与重商小传统关联。

耿车一带的农本传统是主流的，是地方的大传统；与此同时，也发展了独特的商贸小传统。就商这一小传统而言，虽然耿车模式也是工商结合的模式，或者说它的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是家庭手工业推动的结果。但在工—商关系上，它与浙江的“艺商”存在差别，总体而言它重视商业贸易而缺乏对技艺或技术的追求，在工与商的关系上，它把工置于商的后面。耿车地方传统除了与浙商传统存在差异，它的发展与苏南等地的发展也存在差异。在苏南的工商关系中，以加工制造为中心，商业从属于制造业。明清以来，苏常松和杭嘉湖地区，就以丝绸棉布织造见长，上世纪 60、70 年代的苏南社队（乡镇）企业同样以制造见长。而在耿车的发展中，工商关系是以商为主的关系。比如现在已是世界 500 强的恒力集团，它起步于丝织业，1995 年，在笔者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期间，它还只是一个只有几十名员工的丝织企业。但在上世纪 80 年代已经富裕起来的耿车，一直没有孕育出一家大型企业。这或可部分地归结为重商不重工的这样一个地域传统。

历史地回顾耿车模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其特征：

在农—工—商三者关系中，商贸实践置于优先位置。商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维度去理解。狭义的商，主要是商贸，就是俗话说的“做买卖”；广义的商，是工商，是工业（或传统时期的手工业）与商贸的结合。乡土社会的大传统是以农为本，在农业本业的社会里，商贸是辅助性的副业。通常情况下，商贸活动与加工制造很难真正分开，但在现实的实践中，工、商的侧重点可以有所不同。耿车模式重视商业贸易的“商”而忽视制造工艺的“工”，面临后续创新力不足的问题。

从所有制形式及组织方式看，耿车模式是民办与集体的混合模式。在早期，民办企业（作坊）中，有个体和联户两种模式，集体企业中则有乡、村两级。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正是因为耿车的重

商特点，才“野蛮生长”出一个耿车模式来，因此它在苏北乃至江苏都有突破体制的意义。改制之后，虽然所有制差异已经消弭，但因重商传统而衍生的组织形态特点，对其后续的企业组织有深远的影响。

由于耿车镇所从事行业的特殊性，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环境因素与经济的关系，环境维度都是耿车模式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宏观地看，废旧塑料回收加工行业本身是为循环事业做贡献的，它无疑是“绿色”的，但在从事废旧塑料回收加工的过程中因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污染本地环境而成为一个污染严重的行业。持续的环境污染反过来制约、威胁行业的生存。重商传统中的短期经济理性，使耿车人未能很好地处理好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三、重商传统与耿车模式的环境转型

重商小传统不仅形塑了耿车模式，也深刻地影响了耿车模式转型时的路径选择。

纵观耿车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至少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型。

第一次重要的转型，我们可以称之为所有制转型。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全国各地的乡镇企业都经历了市场的转型，也即通常所说的转制。这项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明晰产权，明确权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例如，苏南模式中早期特别强调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在 90 年代后期快速地转向了私有民营。由于耿车模式早期就是“四轮驱动，双轨运行”，私有或民营的成分比较高，所以后续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的发展影响并不大。或者说，这次转制，从国家政策层面确立了市场经营主体的地位，更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明确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性。但由于在为经营者放权的同时，没有相应地强调经营者的社会责任，如环境保护责任，自此之后，环境污染的问题更加突出。

耿车的第二次重要转型可以称为环境转型或绿色转型。环境转型，一方面彻底扭转了长期以来形成的环境污染格局，另一方面，也重创了产业。所谓耿车模式的环境转型或绿色转型，是指通过环境整治，从环境污染严重的生产转向清洁生产。这次转型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环境整治，减少了废旧塑料回收加工过程中的环境

污染。第二阶段，以初具规模的家具电商行业取代废旧塑料加工行业，废旧塑料行业就此退出本地。很明显，耿车废旧塑料回收加工行业是在“铁腕治污”的政策背景下，被强制取消的。第三阶段，对家具生产企业进行疾风骤雨式的环境整治。本文集中关注于环境转型的第二阶段，讨论重商小传统与此次环境转型的关系。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耿车一带废旧塑料回收加工行业的污染问题日趋严重。2004 年，周拥平等人在耿车镇的调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他们“这次考察虽然谈不上深入，但也能在惊叹这 20 年来年世事变化之巨之余，对今日的耿车做出几点判断”，除了发现“农民的生活普遍富裕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环境状况在恶化”，其中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尤其严重。耿车镇的农民们已经为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量的废料被倾倒入附近的河塘里，大部分河水被污染；工人们（也就是本镇和邻近乡镇的农民们）在有毒的气体中长时间工作；即使不直接介入原始的废塑料加工工序的人们也日夜呼吸着有毒气体，因为总有人违反规定将废料直接焚烧；镇里居民的健康状况在全县各个乡镇中排名最后，癌症的发病率最高，尤以肺癌居多^[5]。

我们在其他区域的研究表明，自上世纪 90 年代至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大致是环境污染最严重的时期。我们通过对耿车的一些当事人进行深度访谈，了解到耿车当年的污染十分严重。宏观地看，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带来了普遍的环境问题，但也呈现行业性、区域性和阶段性的差异。就耿车的环境污染问题而言，首先，它体现了该时期全国性的环境状况的一般特点，如环保意识比较差，地方政府的监督不严、甚至“猫鼠”同吃一锅等现象。其次，耿车的环境问题也凸显了废旧塑料回收加工行业自身的特点，如普遍的“脏、乱、差”，准入门槛低，行业不规范等。最后，笔者认为，耿车的环境污染也与重商小传统有关联。

那么，如何来理解耿车的重商小传统与环境污染问题？又如何来解释重商小传统与它的环境转型历程呢？

首先，与农本传统相比，重商小传统体现在重利益、重视投入—产出的理性算计。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工

业化过程中环境污染也很严重，为什么说耿车与所谓的重商小传统关联呢？确实，耿车发展了废旧塑料回收加工行业，并以此为路径依赖，既与当时的“大气候”相关，也与其行业的特性有关，但笔者以为耿车的某些做法，是与重商小传统中的短期经济理性相关的。比如，耿车一带长期从事低端产品的生产。简单地收购、分类废旧塑料，或再辅之以简单的清洗、破碎、造粒等生产活动。生产低端产品，满足于当下的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谋划。又如，废旧塑料加工工艺简单，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对污染不加处理，短期看，污染的成本转嫁到外部了，牺牲了外部环境节约了经营者的成本；但长期看，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实际上又会转化为经营者的内部成本——环境污染影响人体健康，影响工作效率，影响企业的外部形象和社会声誉，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减少污染企业的收益或增加其成本。此外，从事低端产品的加工，行业进入门槛低、充分竞争，赢利水平低，反过来又影响后续的投入和技术改造，形成低水平重复与恶性循环。所以，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期间政府实施“铁腕治污”政策时，企业无法适应激烈竞争的市场与体制环境，只能被动应对了。其实，企业在此之前是有机会通过技术进步，即通过改进回收工艺、加强管理等措施解决或部分地解决环境问题的，但耿车似乎没有主动地采取此类措施。重商小传统不仅体现在早期的废旧塑料回收加工上，也体现在后续的家具电商产业发展上。在转向家具电商产业发展时，生产者依然从事低端产品的生产，没有通过高投入、高技术生产高品质的产品。低投入意味着低风险，投入成本有可能比较快地回收，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竞争力不强等企业发展的致命性障碍。

其次，与农本大传统不同，重商小传统具有更加开放的心态，愿意与外部世界交流，对新事物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能主动获取外部的新信息，主动学习外部的先进经验。这大概是耿车虽居于苏北工业落后的乡村地区，却能走出别具一格的发展道路的原因。

早在 1983 年，耿车镇就主动走出去，到浙江等地学习废旧塑料的加工经验。无论是关于耿车发展的介绍，还是在我们与耿车镇的邱先生交谈时都能发现，1983 年的外访是耿车镇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历史惊人地相似，在耿车废旧

塑料回收加工行业发展至巅峰的时期，同时也是污染最严重的时期，耿车镇的干部和企业代表，又一次到苏南、浙江、山东等地考察。这次考察给邱先生最大的冲击是南方不仅富裕，而且环境好。他甚至说：“在外面转了几圈都不想回家，外面生态好、空气好。和垃圾打交道这近二十年，我干够了，这次考察回来，要学习人家的做法。”（2019年6月8日，邱先生访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邱先生琢磨着如何走出当时废旧塑料行业的困境。与耿车临近的睢宁县沙集镇东风村的电商已有十几户。东风村主要制作造型简单但却时尚且价格较低的家具。由本村木匠自己制作，然后在网上销售。邱先生通过熟人取得与东风村的联系，“偷师学艺”，自己买电脑、开网店。当时，他虽然已近60岁，却努力地去熟悉新业务，学习新技术。邱先生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学习电脑知识、网络操作与电子商务技能。在网络销售取得初步成功后，他又开始购买设备，聘请师傅，自己开工厂生产木质家具。由于电子商务效益不错，越来越多的村民来到邱先生家里取经，学习电子商务，转向家具生产。到2013年，村内从事网店经营的数量已超过全村总户数的1/3，电子商务交易金额超过2.2亿元^③，符合阿里研究院对“淘宝村”的认定标准，成为全国首批“淘宝村”之一。^④

总之，在环境整治压力与新兴产业的引力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耿车成功地由废旧塑料的回收加工行业向家具制作网络销售的模式转型。耿车重商传统中对市场的敏锐性，使他们及早地捕捉到了电商这一新兴行业的商机与潜力。快速崛起的家具电商行业，成为废旧塑料行业的替代行业，并通过产业替代而实现产业的环境转型。重商小传统中的短期经济理性，使它无力从技术创新方面突破废旧塑料行业的污染问题（而事实上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而且它的这一特点再一次嵌入到家具电商行业里，使它再度面临技术创新不足的困境。

四、结论与讨论

应该说，耿车模式的形成及其转型，是一个系统性发展的过程。影响耿车模式的形成和转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

国家的制度背景、地方政策对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耿车模式的形成，无疑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对后续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另外，有些具体的政策，如环境治理政策，虽然它的出台本身是着眼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但在实施过程中，除了改善环境之外，也产生了非预期后果——耿车废旧塑料行业的整体撤退。

与国家的正式制度、政府法规易于产生即时的、显性的影响不同，深层的社会结构、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往往不易被观察到，因此造成研究方面的困难。然而，不能因为影响不易观察就不承认其存在，相反，正因为该议题较为隐匿，所以更值得去探讨，文化本身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是深层而又长远的。就耿车来看，由货郎担经营的重商惯习不仅在废旧塑料的回收加工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还在后续的产业发展和环境转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我们认为重商小传统在耿车模式的形成和转型过程中相对独立地发挥着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受大传统和制度背景的约束。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把地域的重商小传统与发展及转型的关系单独地提出来讨论，只是研究的需要，但并不是说我们的研究对象本身是静止不变的，事实恰恰相反，传统本身也在快速地演变中。芮德菲尔德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讨论了文化的多层次性，以及文化的相互融合与转化的议题。就静态结构看，大传统、小传统似乎对应着相应的阶层——大传统对应着统治阶层、社会精英，小传统对应底层的农民，因此，大传统、小传统似乎可以独立地运行。其实，文化本身并不真的是静态的，它们是不断地演变着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发生的旷日持久但又具有特色的、而且总是不断变化着的互动现象”^[15]（P115）。一方面，大传统不断吸收来自民间的小传统的内容，另一方面，大传统一旦发展成熟之后，就让遵循小传统的人们都来学习，进而进入民间社会。在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作为正统的儒家思想，是来自民间的私学，而成为正统之后，又强化、深入到民间——无论作为早期儒家的孔子思想还是新儒家的朱熹新儒学，都有这个特点。

农本原不是儒家思想，但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几乎无意识地融入到儒家传统中。传统中国，以农

为本，因此，就某个阶段、某个具体的做法说中国有“重农抑商”倾向也有道理，但客观地讲，中国传统上以农为本、工商兼顾可能是更为一般的状态。

然而，随着一个多世纪的近代化演进，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历程，工商业传统正在逐步建立起来。包括耿车在内的中国农村地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工商业传统正在替代农本大传统。从三项产业结构比例看，2020年中国的第一产业（农业）仅占GDP的一成，而二、三产业（非农）已占九成。从人口结构看，城镇人口比重已接近三分之二。就耿车所在的宿迁市看，其非农产业占比、城镇化率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考虑耿车的发展格局，无论其工商业发展水平，还是从事工商业的能力都处于宿迁市农村的领先地位，所以，我们可以说，它原本的重商小传统，已经上升也正在向大传统转化。

传统意义上的工商业是缺乏环保理念的，但在中国的工业化历程中，绿色的理念与实践逐渐地嵌入到工商业传统里。清洁生产与绿色理念的形成，一方面是出于国家环保政策的压力而不得不这样做，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基于过去的环境污染挫折还是展望未来的绿色利益，企业家逐渐建立起生态利益自觉的行动，地方政府也逐渐地走向政治生态自觉了。原本的耿车模式缺乏绿色传统，在经历了艰难痛苦的环境转型之后，转型沉痛成为社会记忆，绿色理念已逐渐植入到新形成的工商业传统以及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去了。我们观察到，在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动下，耿车镇致力推动清洁生产和村庄环境卫生整治，打造美丽乡村。绿色不仅得到当地村民、企业的认同，也得到政府的认可和强化，再经由媒体的输出，并在输出中进一步强化。因此，绿色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

[注 释]

- ① 如果对“重农抑商”和“以农为本”两个词进行细致分析，还有比较大的差异。“以农为本”，只是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商业、手工业是可以成为重要补充的，而“重农抑商”所要表达的含义，除了对农业的重视，明显地存在对商业的排斥态度。就中国秦汉以来两千余年的历史看，以农为本无疑是为基本态，在局部的时空上确实也存在抑商的做法。
- ② “宿迁”一词所指的行政区域在不同时期可能有所不同，耿车镇的行政隶属也有所变动。1987年之前为宿迁县，1987年宿迁撤县建县级宿迁市。1996年，成立

地级宿迁市，原宿迁市（县级）划为宿城区和宿豫县，耿车镇属宿豫县。2004年，因宿豫撤县建区，将其原来所辖的耿车镇等7个乡镇划归宿城区。

- ③ 数据来源：大众村村委会文件。
- ④ 阿里研究院对“淘宝村”的认定标准主要包括：（1）经营场所：在农村地区，以行政村为单元；（2）销售规模：电子商务年销售额达到1000万元；（3）网商规模：本村活跃网店数量达到100家，或活跃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的10%。参见：<http://www.aliresearch.com>。

[参考文献]

- [1] 厉以宁. 希腊古代经济史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2] Dieter Kuhn. The age of Confucian rule; the Song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of Harvard University.
- [3] 费孝通. 淮阴行（上）[J]. 瞭望周刊，1986，（35）.
- [4] 胡同恭. 论耿车模式 [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1）.
- [5] 周拥平，高明华，蔡春香. 社会如何更美好——重温费孝通先生的富民思想和重（初）访耿车的思考 [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6）.
- [6] 王刘飞，王毅杰. 转型社会中运动式治理的价值探讨——以元镇环境治理为例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
- [7] 陈涛，李鸿香. 环境治理的系统性分析——基于华东仁村治理实践的经验研究 [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
- [8] 李江涛，卢永超. 电商产业集聚“耿车模式”的分析与研究 [J]. 经济研究导刊，2017，（2）.
- [9] 周大鸣，向璐. 社会空间视角下“淘宝村”的生计模式转型研究 [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
- [10] 陈然. 地方自觉与乡土重构：“淘宝村”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 [11] 张军. “敲糖换鸡毛”催生“拨浪鼓文化” [J]. 浙

- 江学刊, 2003, (1).
- [12] 舒国增. 改革发展激活“拨浪鼓文化” [J]. 浙江学刊, 2003, (1).
- [13] 厉佛灯. “拨浪鼓文化”之开放性的经济学诠释 [J]. 浙江学刊, 2003, (1).
- [14] 费孝通. 乡土中国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 [15] 芮德菲尔德. 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 [M]. 王莹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 [16] 郑萍. 村落视野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 [J]. 读书, 2005, (7).
- [17] 吾淳. 重新审视芮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1).
- [18] 陈立旭. 区域工商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发展——对传统浙商晋商徽商的一种比较分析 [J]. 浙江社会科学, 2005, (3).
- [19] 刘成君. 印象耿车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
- [20] 费孝通. 小城镇再探索 (之二) [J]. 瞭望周刊, 1984, (21).

The Tradition of Mercantilism and the Gengche Model with its Environmental Transformation

CHEN A-jiang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00, PRC)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is an old topic. The tradition of valuing agriculture or commer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overall great tradition of valuing agriculture,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localities have formed regional small tradition of mercantilism.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big and small traditions, we can understand the emphasis on small traditions of Gengche and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Gengche model. The market-oriented characteristics of Gengche's busines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Gengche model. Howev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ngche's small tradition of focusing on business and ignoring skills have limited the advancement of waste plastics processing technology. Its characteristics of focusing on short-term interests also caus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context of "iron-fist pollution contro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he waste plastics industry was forced to cancel. The openness in the small merchandising tradition makes producers good at learning from the outside world. Some enterprises have explored e-commerce, and then developed the new Gengche model with furniture manufacturing e-commerce as the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thus completing the environ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waste plastic recycling and processing industry.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modernization,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raditions are replacing the agricultural tradition as the mainstream, and green ecological culture is embedded in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small tradition; Gengche Model; green transformati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岳天明/校对 正圭)